“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

张永刚 张 瑞

摘 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内含文化自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为三重特质。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重要方法论，“第二个结合”的逻辑理路与高扬文化主体性高度契合。“第二个结合”蕴含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守正与创新结合、理论与实践互促三对辩证关系。三者相互交融、各有侧重，系统贯穿于文化主体性巩固的全过程。其中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筑牢文化自立的存在论根基，依靠守正创新的辩证思维完成文化自觉的认知建构，依托理论与实践双向贯通达成文化自为的实践确证。据此，通过坚持文化认同以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实现文化自为，构成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进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文化主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26)09-0050-12

中华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本体自觉与价值坚守，彰显出鲜明且坚定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291 学界对此已有较为丰富的积累，着重从数字叙事、主体性能力、文化实践[2-4]等维度加以把握，为探讨其巩固路径奠定了学理基础。

巩固文化主体性离不开“两个结合”的支撑，其中“第二个结合”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有效路径。学界围绕“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形成了若干研究进路。一是多视角解析其内涵特征，或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揭示“第二个结合”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5]，或从方法论角度来论及“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内涵及其意义[6]；二是从价值意涵或意义角度阐明“第二个结合”化解了文化殖民危机、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打开了中华文化的创新空间[7]；三是从自主知识体系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出发，阐明文化主体性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质要求，“第二个结合”为此提供了基点[8]。基于上述研究进路，将“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自觉与文化主体性的“自立、自觉、自为”三重维度进行联系，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体系化建构。

文化主体性“自立、自觉、自为”的三维分析框架，植根于主体性哲学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辩证逻辑，三者分别对应文化主体性的存在论根基、认知中介与实践旨归。具体而言，首先需要确立独立存在的本体根基，这就是文化自立，对应主体性的“自在”阶段，它确证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独立地位。继而形成对自身传统的理性认知，这就是文化自觉，构成从“自在”到“自为”的反思跃迁，使中华民族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明论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普遍历史意蕴研究”(22BKS073)。

作者简介：张永刚，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张瑞，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

越对传统的自发依循,在古今中西的交织中形成对自身文化来历与特质的自知之明,主体性由此获得观念层面的自觉形态。然而,停留于认知领域的自觉终究不完整,最终还需实现能动的文化创造,这正是文化自为。文化自为作为“自在自为”的辩证统一,意味着在能动的文化创造中完成主体性的现实确证。“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守正与创新结合、理论与实践互促,为文化主体性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在自为”的辩证跃迁提供了现实路径。

一、文化主体性的结构分析与巩固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291 这为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提供了方法论前提。理解“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首先需厘清文化主体性的基本维度及其在历史实践中所面临的核心张力。

(一)文化主体性的三重维度及其核心张力

之所以从自立、自觉、自为三重维度把握文化主体性,既有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也源于中华文化近代以来历史实践的内在规定性。从哲学依据来看,此三维框架植根于主体性辩证发展的基本逻辑。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以“自在”“自为”与“自在自为”的递进来描述意识从直接存在到反思自身、最终达至实体与主体相统一的过程①。而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一范畴序列,指出“实践创造对象世界”[9]162,从而将主体性从精神的自我直观转向人的现实实践。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性的真正确证不在于精神的自我认识,而在于人通过实践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高清海在阐释人的主体性时强调,人作为“类”存在,其本质“是同人的后天活动联系在一起的”[10],属于人的后天自为的本质。文化主体性作为民族共同体在文化领域的主体性表现,同样遵循这一辩证逻辑,它首先需要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独立的文化存在,继而通过理性反思形成对自身文化命运的自觉把握,最终在创造性实践中实现主体性的自为确证。以上三个维度共同构成文化主体性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能动的演进序列。从历史规定性来看,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下面临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危机。这场危机并非单一层面的困境,而是在文化自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为三个维度上同时存在,三者共同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巩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域。

首先,文化自立构成主体性的存在论根基,它回答的是主体性何以可能这一哲学前提问题。文化若不能在存在论层面确证自身的独立品格,便无从谈及主体性。近代以来,文化自立的危机集中体现为自我与他者的深刻张力。1840 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西方思想文化同时涌入,使中华文化第一次遭遇全方位的他者挑战。“以西代中”的激进主张与“中体西用”的保守立场形成持久对峙。

文化自立的真正难题在于如何在外来普遍性与本土特殊性之间找到一条既不封闭排外、又不盲目依附的自主发展道路。因此,文化自立要求中华民族在多元文化碰撞中保持自主意志,既非盲目排外,亦非被动接受,而是在吸收外来优秀养分的同时始终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这种自立性具有双重向度:就客观存在而言,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在实践中创造的成果,拥有相对独立的存在根基。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1]668 文化、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制约,构成了社会系统演进的内在动力。就主观意志而言,中华民族在价值判断上保持精神独立,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使

①黑格尔在此以“自在”“自为”与“自在自为”的递进描述意识从直接存在到反思自身、最终达至实体与主体相统一的辩证历程,为理解主体性从自发到自觉的跃迁提供了经典哲学范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14-19.

文化成为自我塑造、自我表达的力量。由此，文化自立为主体性的后续展开奠定了根基，而它所面临的核心张力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构成了“第二个结合”首先需要回应的理论课题。

其次，文化自觉充当主体性的认知中介。仅有自立而无自觉，主体性便会停留于自发的存在状态，难以获得理性的方向感。文化自觉所要解决的，正是主体性如何获得自我认知的理性能力这一关键问题。费孝通界定文化自觉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2]22，并强调其根本目的在于 “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12]22。这种自知之明不是简单的文化怀旧或自我肯定，而是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审视。

近代以来，文化自觉的危机集中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张力。“古今中西之争”的长期胶着，使这种自知之明变得异常困难。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被简化为二元对立，或视传统为现代化的障碍而加以激进否定，或将传统固化为不可变更的教条而拒绝革新。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取向，都难以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和批判性继承。

文化自觉的真正难题在于如何在尊重传统与推动创新之间保持辩证张力，既不固守文化原教旨主义，也不堕入历史虚无主义。于历史维度，它要求回溯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体认本民族文化的起源、本质和演进逻辑，以明晰文化传承的历史必然与时代发展的内在依据。于现实维度，它要求在世界多元文明的比较中，理性认知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内在局限，明确转型方向与发展路径。文化自觉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古今中西的交织中把握文化定位，为传统与现代的衔接提供认知前提。可以说，它所面临的核心张力即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巩固的第二个理论课题。

最后，文化自为实现主体性的实践旨归，它对应“自在自为”的辩证综合形态，所要回答的是主体性如何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实现自身。如果说文化自觉主要停留在认知领域，那么文化自为则完成了从认知到实践的跃迁。马克思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9]544 这为理解文化自为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主体性的最终确证不在于自我宣称，而在于改造世界的现实能力。

近代以来，文化自为的危机集中体现为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张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西方模式的被动追赶状态。无论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师夷长技”，还是制度文化层面的效仿移植，都带有明显的“外源性”特征。文化自为的真正难题在于如何将文化理想转化为现实创造，如何从被动的现代化走向主动的文明创造。

文化自为体现为文化主体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对外部世界各类规定性的辩证扬弃与内在吸收，以此塑造自身本质，并通过社会实践将其外化呈现。它要求文化主体在传承与革新的辩证运动中超越既有文化范式的局限。文化范式是特定时代基于共同价值理念与伦理规范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对群体成员发挥引导与教化功能。然而，当社会条件发生根本变革时，保守僵化的文化范式便会束缚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因此，文化自为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文明对话中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固有逻辑，开辟出文化发展的全新境界。它所面临的核心张力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巩固的第三个理论课题。

综上，文化自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为构成文化主体性从存在根基到认知反思再到实践创造的递进结构。三者虽各有侧重，却非先后相继的线性阶段，而是在历史实践中相互渗透、共同展开。这种非线性的结构意味着，三重张力的化解无法依赖单向度的策略，而须在辩证综合中寻求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三重内在张力，这是同一主体性危机在不同层面的呈现。巩固文化主体性需要整体性的方法论支撑。中国共产

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辩证解决方案，从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走自己的路”的坚定探索，再到新时代“第二个结合”的系统阐发，表明解决文化主体性面临的张力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对立面的有机统一。“第二个结合”作为方法论自觉的结晶，以普遍性与特殊性、守正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逻辑，为化解上述三重张力、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正如有学者阐释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正是这一认识的理论结晶[13]。

（二）文化主体性巩固的方法论诉求

上述三重张力各有侧重又彼此关联，均无法依靠单向度思维化解，须借助辩证综合的方法论加以把握。文化自立要在拒斥封闭排外与消解自身主体性之间锚定文化自主，聚焦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文化自觉需要对传统和现代形成理性辩证认知，指向守正与创新的融合问题。文化自为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在不脱离实际也不放弃理想之间实现能动创造，其实质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如何互促的问题。

答案蕴藏于中国共产党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经验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288。其中，“第二个结合”尤为集中地体现了回应上述三重张力的方法论自觉。

之所以说“第二个结合”具有这一功能，是因为它内在地包含着三对辩证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守正与创新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互促。具体而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回应的是文化自立中自我与他者的矛盾，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如何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文化自立的本质正是在外来普遍性诉求与本土特殊性坚守之间寻求平衡。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深刻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守正与创新的结合，回应文化自觉中古与今、中与西的矛盾，以及如何在坚持文化根脉的同时实现理论创新。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的认识。理论与实践的互促，回应的是思想理论如何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文化领域的延伸。这三对关系分别从存在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维度回答了文化何以自立、何以自知、何以自为的问题，构成“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骨架。

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对辩证关系并非与文化主体性的三重维度一一对应。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固然在存在论层面为文化自立提供根基，但它同样影响着文化自觉的认知框架和文化自为的实践方向。守正与创新的结合在认识论层面为文化自觉提供方法论指引，守正为文化自立提供价值支撑，创新为文化自为开辟创造空间。理论与实践互促在实践论层面为文化自为提供确证路径，然而实践也检验着文化自立的存在根基，理论同样深化着文化自觉的反思深度。三对辩证关系各有主导作用域而又全域渗透，共同构成文化主体性巩固的完整方法论基础。

这种辩证逻辑决定了“第二个结合”不是简单的文化拼盘或折中主义。它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价值；既要求坚守文化根脉，又鼓励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注重理论引领，又扎根实践沃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辩证运动中开辟出文化发展的新境界[1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1]291。“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不是外在的工具与对象，而是问题结构与解决逻辑的内在契合。文化主体性的三重维度规定了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二个结合”的三

对辩证关系则提供了化解这些问题的逻辑遵循。

二、“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辩证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289。这并非简单嫁接,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互释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与文化基因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要素内在契合,构成二者跨时空结合的内在依据。依托“返本开新”的辩证运动实现文明范式革新,完成主体性的逻辑建构。文化本源与精神内核的融合夯实文化自立根基,传统文化积淀与时代文明特质的交融培育文化自觉意识,思想价值向现实场域的延伸拓展文化自为格局,由此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确证文化自立

依托“第二个结合”,这种融通积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底蕴,既传承民族自立精神,也从文化本源夯实中华文化主体立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并非仅作用于文化自立这一单一维度,而是在文化自立层面承担着化解自我与他者张力的核心方法论功能。

置身“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唯有扎根华夏文明沃土,方能形成契合本土语境的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也须在科学思想引领下完成时代重塑与内涵升华,凝练出可以互鉴共通的文化智慧。二者相互作用,形成“普遍原理具体化”与“民族经验世界化”的演进态势。一方面,二者内涵的相通性在自我与他者互鉴维度上确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念、方法与原则层面多有内在契合。譬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统一观,契合马克思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传统“分合相生”辩证思维与唯物辩证法原则相近,“天下大同”社会愿景与共产主义价值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发展的浸润涵育,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内在驱动力。文化之“优秀”须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剔除不合时宜的陈旧成分,完成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升华。

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的可能性,成为“第二个结合”理论建构的首要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东方中国的文明沃土,是延续千年的传统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则是产生于近代欧洲的工业文明,是现代社会的先进理论。近代中国在“古今中西”的文化激荡中选择了来自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其深层依据正是二者在精神底色上的内在互通性。近代中国虽有如严复翻译《天演论》引介西学之举,但自由主义、分析哲学等英美理论流派因深层文化结构性差异,都未能与中国社会深度融合。相较之下,欧陆哲学在中国引发深度理论回响。例如,毛泽东同志在研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关于“道德判断”的论述时,在所做批注中谈及该思想与我国宋儒之说的相似性,指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15]190,“此与吾儒家之伦理学说合”[15]222。究其根源,欧陆哲学与中华传统思想均立足义务论、动机论,重视道德主体的内在人格完善。英美哲学追求逻辑确定性,欧陆哲学强调历史语境、创造性和对人的存在的整体理解。可见欧陆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存在更强的亲和性,进而让继承并发展了欧陆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更自然地融合中国社会、落地生根[16]。

对于外来的思想资源,需要使之适合中国的环境。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7]也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接续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任务,同样体现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层塑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8]315 中华文脉中义利兼顾的传统经济智慧为新时代改革发展与共同富裕事业提供文化滋养,以仁政爱民的政治智慧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逻辑注入文化底蕴,以和为贵的交往理念则为对外开放提供了价值指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良渚、二里头、殷墟等遗址的系统发掘,以考古材料证实了中华文明史的连续性,为文化自立提供了物质性根基。由此,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出真理力量,从而突破了近代以来的文化依附困境,在重塑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中坚定文化自立自信,确证中华文化主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在本体层面确证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使中华民族在多元文明格局中获得了独立自存的根基。这种统一也为文化自觉提供了“知人之明”与“自知之明”的认知前提,为文化自为奠定了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实践基点。

(二)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增益文化自觉

在确证中华文化独立品格的基础上,“第二个结合”进一步以守正创新的辩证智慧,推动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未来走向形成系统理性认知。“第二个结合”将守正与创新内在统一起来,昭示着中华民族唯有站稳自身文化根基,方能持续激发发展动能。其不仅提升文化自觉,同时承担化解“传统与现代”张力的核心方法论功能,巩固文化自立根基、赋能文化自为创造。守正,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并在思想建构和实践场域中遵循“两个结合”的价值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1]95-96 因此,创新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底蕴,拓宽思想理论发展视域,以此生成贴合国情现实、饱含本土特质的思想成果与实践模式,持续焕发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蕴含着辩证扬弃、推陈出新的哲学思维,为化解古今中西的文化张力提供了现实可能。

冯契指出,“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便付之于实践”[19]。“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融合中生成新的文化形态。近代以来,“体用之争”折射出中华民族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主体性危机。依托“第二个结合”秉持的守正创新理念,能够明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的内在逻辑、结合缘由以及实践路径,其“结合”的意义“不仅仅是契合,还包括创造,即新的意义生成”[20],通过“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289,为总结并超越“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现实答案,彰显和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1]289“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内嵌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第二个结合”突破了既往文化建构中常见的“体用二分”思维,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转化为内在的“化生”。聚焦集体记忆的传承创新视角,“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溯源历史文脉,在汲取传统文化的同时坚持辩证取舍,从而选择贴合社会发展趋势、适配现实发展格局的优秀文化内容。积淀形成顺应潮流的精神内核和道德素养,持续为时代发展积蓄文化力量。河南卫视《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节目,以“5G+AR”技术赋能传统节庆文化,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完成视听语言的时代转译,印证了守正创新是在更高层级上实现传统的自我更新。

综上,“第二个结合”一方面依托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指引中华民族以理性态度对传统文化加以审视与剖析。另一方面,它又以“新的文

化生命体”厚植面向未来的文化自觉。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提出“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1]7,其原初语境在于阐明新社会的诞生体现为建立在对旧世界矛盾运动的批判性剖析之上。以此方法论审视文化传承,“第二个结合”既传承中华文脉,又突破传统局限,进而构建起中华文明的现代文化新形态,同时又以“新的文化生命体”超越西方现代化文化路径,彰显文化自觉,促进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历史性跃升。由此,守正与创新的结合不仅完成了文化自觉的认知建构,也通过“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巩固了文化自立的精神根基,并为文化自觉的能动创造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理论与实践互促增强文化自为

“第二个结合”遵循实践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在认知现实与能动建构的有机统一中增强文化自为能力,稳固中华文化主体建构的实践基础,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需要区分的是,文化自觉侧重于在“向内反思”中认识自己,呈现为一种“解释世界”的维度,而文化自为则强调向外对象化。前者注重“知”的维度,后者侧重“行”的角度。文化自为不同于一般社会实践,正在于其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以文化创造为指向的能动性实践。因此,文化自为的评判标准,往往着眼于文化创新成果的涌现、文明发展格局的更新以及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主体地位的确证。

以此审视,“第二个结合”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语境,形成伊始便不囿于纯粹认识论范畴。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并与本土国情相融的漫长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推进“第二个结合”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社会提供了文化依托,一代代共产党人持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科学文化方向。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长期历史传承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浸润人心的共同价值遵循。“第二个结合”着眼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内在融通,使其充分融入社会日常发展与大众现实生活之中。这种理论向生活的下沉,往往呈现为群众自发的文化创造活动。贵州“村BA”正是基层群众在传统篮球民俗与现代传播手段的融合中自发开展的文化创造活动,生动体现了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为的转化。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超越了“文明冲突论”思维定式,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民族特质,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为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

在理论指引上,“第二个结合”增益文化自为表现为从二元思维到间性思维的范式转化。旧有的“西方中心论”自诩“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21],在该逻辑主导下催生出一种“中心—边缘”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然而,“促成现代化的机构和制度在东方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话,也一样可以造成同样的现代性”[22]。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是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为核心要义,从而为超越“西方中心论”提供了中国方案。诸如“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等观点,便鲜明体现出中华文化对多元共生的价值坚守。在实践遵循上,文化自为体现为实现精神独立自主。文化自为的现实践行作为文化主体性的目标指向,意味着中华文化在完成自我主体性建构之后,形成具备世界价值的引领性共识,推动世界文明范式实现现代性转型。而实现文明转型,则需要秉持面向世界的责任担当,消解资本逻辑统摄下的单一“普世价值”叙事,实现世界文化共性与个性的契合。

可见,理论与实践的互促不仅以文化自为的实践确证为旨归,同时也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持续深化巩固了文化自立的经验基础,并通过实践反馈机制深化了文化自觉的现实认知。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推进文化主体性从“自

在”经“自觉”向“自在自为”的辩证跃迁。

三、“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23],这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义在于在兼收并蓄中彰显自身特色。面对文化同质化风险、传统转型难题与文明交流失衡对文化主体性提出的挑战,应推动“第二个结合”由理论方法论转向现实实践,实现历史经验、思想方法与现实运用的辩证循环。依托普遍性与特殊性互促构建文化认同,以守正与创新推进传统文化革新,在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中拓展文明对话空间。由此,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展开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一)坚守文化发展自主性,厚植文化自立根基

文化自立构成主体性的存在论根基,其现实巩固首先指向在多元文明互动中保持文化发展的自主性。“第二个结合”内蕴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昭示着中华文化现代化不能照搬外来模式和闭关自守,而须在开放包容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坐标,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始终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这种自主性有别于狭隘的文化排他,而是在辩证否定中实现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吸收,使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独立品格。

文化自立在本体层面的奠基,往往诉诸文化认同这一深层认同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4]文化认同体现为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积淀中生成的内在文化禀赋与共同价值内核,使得中华民族在多元文明碰撞中保持“我是谁”的存在论自觉。这种内在的文化同一性,呈现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基础。文化认同有别于抽象的情感投射,它承载于文化符号、历史叙事和价值理念之中,呈现为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归属的深层体认。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文化认同的强化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学理阐释和价值凝练,使其从潜在的文化基因转化为显性的精神标识,从而在多元文化思潮冲击下保持主体自觉。这种认同的确立,超越了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在古今中西的辩证张力中,通过对文化根脉的理性体认,建构起扎根历史并面向未来的民族身份意识。共同体成员在多元身份张力下仍能巩固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文化认同由此发挥凝聚思想共识的功能。文化认同的深层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对中华文化符号、民族身份与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性确认,使个体在文化归属中寻找到存在的意义根基,进而为文化自立提供心理支撑。

与此同时,文化认同的深层建构,最终指向文化自信的内在生成。梁漱溟指出:“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25]独立自主、日新其德,可视为中华文化赓续传承的精神特质。新时代巩固文化自立基础,指向在多元文明互动中坚持中华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原则,强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理论阐释,建构并完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涉及深入探寻传统文化根脉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契合性,审视当下文化表征,发掘内隐于群众日常实践的精神禀赋,凝练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基因表达体系和叙事框架,并随时代发展动态更新其内涵指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同于对外来学术范式的简单排斥,而在于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明传统,形成解释中国现象、回应中国问题的独特方法论范式和学科系统。通过原创性理论回应时代课题,推进学科自主的范式跃迁,从而塑造彰显中国特质和世界价值的文化形象。这种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映现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使文化自立从情感认同上升为理性自觉,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建构。

(二)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文化自觉认知

“第二个结合”所昭示的守正创新逻辑,为化

解“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提供了认知前提,但文化自觉的深化,最终需落脚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之中。这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守正”的文化底色与“创新”的时代要求具体地统一于当代文化实践中。

文化自觉的深层建构,指向主体对自身文化存在方式的理性反思和价值重估。冯友兰“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命题所蕴含的对传统精神的理性承续,区别于简单的文化怀旧,而映现出对文化基因、历史脉络与发展命运的深刻体认。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辨析、批判吸收与创造性转化,从而实现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建构,在守正与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开辟出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

一方面,建构科学的甄别与转化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26]这意味着文化自觉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与消极因素的内在分野保持清醒认知。因此从现实出发,对传统文化予以理性甄别与扬弃创新,成为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强调顺天应时的生态理念,动态平衡的认知范式,协和共处的文明观念等,构成传统文化中可资继承的思想资源。而对于不求甚解的思维倾向,崇道贬技的评判取向和重虚轻实的价值偏向等则须辩证扬弃。从哲学层面审视,这种批判性继承体现了黑格尔所谓“扬弃”的辩证逻辑,对旧有规定性的同时否定与保存,在历史的否定性运动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谐理念、大同理想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改造,被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实现从传统政治伦理向现代治理智慧的范式转换。这种范式转换指向深层价值理念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级,体现出文化自觉对传统文化历史合理性与时代局限性的双重把握。

另一方面,拓展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践场域。深化文化自觉,关键在于科学把握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依据时代价值导向对其内核进行提炼,运用“和合”文化所内含的协调智慧,平衡古今、中西、雅俗文化之间多元差异,使传统文化“创造新的组合,脱离陈旧的形式”[27],为传统文化适配现代社会结构,实现时代性转型提供良好文化支撑。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生态智慧,在当代被重新诠释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被升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愿景。这种创造性转化,既保持了文化基因的连续性,也实现了文化表达的现代性更新,映现出文化自觉对文化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的深层体认。同时,技术变革为传统文化活化传承开辟了新路径,使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调试,指向对文化基因的选择性激活与重组,使其在回应现代性挑战中展现出新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

此外,文化自觉的增进还离不开持续的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传统文化,破除文化原教旨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在辩证否定中理性扬弃传统,从而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深度自觉与历史性巩固。它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其深化最终指向文化自为的实践境地。

(三)推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达到文化自为之境

“第二个结合”蕴含理论与实践相融通的方法论取向,指向中华民族须立足世界多元文化时代背景,在推进文明对话交流中达到文化自为之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8]这一论述为文化自为在国际场域的展开提供了价值遵循。它并非文化闭关自守或亦步亦趋,而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胸襟,在平等的文明对话中实现文化创造的突破。推进文明交流互鉴虽以达成文化自为作为旨归,但其过程同时拓

展着文化自觉的认知视野,并确证着文化自立的主体地位。

文化自为的发展遵循主体性辩证运动逻辑,主体在与异质文化他者互动中外化本质力量,克服异己性,完成文化主体性的充实确证。这种辩证运动要求确立一种开放的文明观,将异质文化他者看作自我完善的必要中介,而非对立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9]520 文化发展同样遵循普遍交往的历史规律,只有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文化主体性才能获得充分发展。

首先,文化主体性在实践层面实现双重面向的统一。历史文脉和语言体系教育,须融入个体文化身份的建构,同时,在交流互鉴中优化本土文化的传承路径与发展样态。这体现出文化自为对反思性认同的诉求,在保持文化根脉同时保持认识论的开放性,在“守”与“变”的辩证法中维系文化生命动态平衡。

其次,持续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互信。文化自为的深层机理在于交往实践的拓展,即在不同文化主体的物质生产与普遍交往中达成相互理解,形成超越单一文化局限的共同意义域。因此,跨文化理解力的培育构成文化自为能力的基础性工程,唯有具备理解他者的能力,才能在差异中凝聚共识,从而提升文化创造能力。这种共同意义空间的形成,构成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价值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心理基础。

最后,构建并培育以全球责任感为内核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18]78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向度,它以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为根基,在践行全球责任、参与人类文明进步中,持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者的角色。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是文化自为的终极指向。因此,立足全球视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维护文化多样性提供重要支撑。同时,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将其系统运用于全球性危机与国际矛盾解决之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文化自为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球责任感的培育,使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在承担世界历史使命中彰显出普遍的人类关怀,从而实现从民族文化主体性向人类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跃升。中华文化积淀了和合共生、天下大同、讲信修睦的深厚精神内核,蕴含着化解文明冲突、消弭发展分歧、破解全球性治理困境的东方智慧[30]。

概言之,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张力中保持了中华文化的动态平衡,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同时吸纳借鉴域外先进文明成果,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四、结语

“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探索,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在文明转型时期对自身文化命运的应答。它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互构中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即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中实现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面向未来,文化主体性的巩固面临更为复杂的时代境遇。数字文明的深度演进正在重塑文化生产的底层逻辑,生成式人工智能挑战创作主体性并冲击文化自为的创造根基,算法推荐消解消费自主性且弱化文化自觉的反思空间,这要求“第二个结合”在方法论层面回应技术哲学的新命题。同时,文明对话中的“逆全球化”思潮与身份政治极化,也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出了审慎与开放的双重诉求。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

合”所开启的文化主体性建构需要迈向更具反思性的理论形态。在认识论维度，应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华传统文论核心范畴的融通研究，构建既能阐释中国经验又具有对话能力的标识性概念。在实践论维度，需将文化主体性培育与日常化生活政治相结合，使价值认同从制度性宣传转化为主体性意义生成。在世界历史维度，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为超越文明冲突论提供规范化方案，使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成为推动全球文明正义的积极力量。总之，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在坚持文化根脉与回应时代之变中保持辩证张力，“第二个结合”作为方法论自觉，最终指向一个具有开放气度和富有创造活力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2]郭慧慧，陆永胜.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数字叙事：价值意蕴、困境审视及纾解之策[J].重庆社会科学，2026(2)：109–119.

[3]韩震.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世界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4)：36–41，203–204.

[4]沈湘平，邢海峰.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关系辨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6(3)：37–45.

[5]李毅.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第二个结合”[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1)：1–12，200.

[6]杨志平，洪小淇.“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及其突出理论特征[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26–32.

[7]邹广文，方立波.论“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内涵[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7)：25–34.

[8]章瀚丹.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新疆社会科学，2025(4)：1–9，17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50.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13]顾海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精粹和学理挈要[J].学术界，2023(12)：5–12.

[14]张岩磊.论“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内涵及其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0)：37–48.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6]韩升，吕叶青.“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逻辑[J].东南学术，2025(2)：1–9，245.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9]冯契.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1)：109–123.

[20]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90.

[2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61.

[22]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48.

[2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2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23:285.
[25]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5.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27]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从刊编辑委员会,白嗣宏.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8.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58.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30]刘力.正确政绩观引领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现实基础与实践进路[J].重庆社会科学,2026(4):2-17.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Second Integration

Zhang Yonggang Zhang Rui

Abstract: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ncompasses three cor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elf-reliance,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cultural self-activity. The Second Integra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 logical framework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cultural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i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he three pair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inherent in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combination of upholding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mong them,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establishes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self-reliance,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that uphold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s new ground completes the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the two-way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chieves the practical confirmation of cultural self-activity. Therefore, upholding cultural identity to consolidate cultural confidence,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deepen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facilitat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to achieve cultural self-activity constitute the practical approach for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new era,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Key Word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易晓艳)